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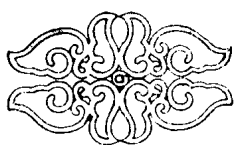


搶救祖國
文獻的珍貴
記錄

鄭振鐸
先生書信集

劉哲民 陳政文 編
學 林 出 版 社





搶救祖國
文獻的珍貴
記錄 ●

鄭振鐸
先生書信集 ●

劉哲民 陳政文 編
學 林 出 版 社

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

劉哲民

編

——鄭振鐸先生書信集

陳政文

學 林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文廟路一二〇號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發 行

上 海 師 範 大 學 印 刷 廠 印 刷

八五〇×一一六八毫米

三十二開本

印張十三·七五 插頁四

字數二七七〇〇〇

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一——二五〇〇

書號 ISBN7-80610-672-X/K·42

定價：九·八〇圓

責任編輯：陳政文
封面設計：陸全根

出版說明

一、鄭振鐸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抗日戰爭期間，他在淪為孤島的上海，與張詠霓、何炳松、張元濟等人，不顧個人安危，歷盡艱辛，搶救了一大批我國珍貴的古代典籍。本書所收鄭先生的書信，大都是有關這一工作的。許多信件感人至深，表現了鄭先生偉大的愛國主義激情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少量抗戰勝利後，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所寫的信函，也反映了鄭先生對文物、考古、出版工作的關心和熱愛，反映了他對保存和發揚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巨大熱忱和執著追求。

二、本書共收入鄭振鐸先生自抗日戰爭初期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期間，致張詠霓、趙景深、張元濟、唐弢、夏鼐、郭寶鈞、蘇秉琦、顧廷龍、徐森玉、劉哲民、徐伯郊、梁思永、郭若愚等人的信，共三百八十四封。分別收信人，按時間先後排列。文字均保存原貌，祇對個別筆誤等錯漏作了訂正。

三、因年代久遠，手書的原信有些地方字迹模糊，經編者反覆查考，或多方探詢，大多已得到解決。但仍有少量無從查考的信，字迹不清之處祇能用□□□□標出。

四、為便於理解，我們請劉哲民先生寫了一篇『前言』，對這些信件的回信人，附以簡要介紹，信中涉及的人名和事件，加了注釋。

7/14/2004

前言

劉哲民

一九八八年《鄭振鐸先生書信集》影印本出版，對編輯這部書的來說，雖然在素材的收集盡了一點力量，但在編輯工作方面却出了不少的訛誤，因為我在發印小樣以後，即入醫院進行手術，領導上照顧我，不讓我過問。每念鄭先生生前對出版工作非常謹嚴，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容稍有忽略和訛誤，因而每披閱到這部書信集的時候輒有不寒而慄之感！鄭振鐸先生哲嗣爾康世講知道了這一情況，來信安慰我說：「出版此書，已十分不易」，「出版社為保存文獻，不計工本之精神，也是難能可貴的。」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中央文化部在北京召開「鄭振鐸學術研討會」，參加會議的多認為鄭先生對於中國的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在歷史、木刻、版畫、版本圖籍、文物鑑定、考古發掘、繪畫藝術、古典文學和戲曲，還有現代文學等都有傑出業績，但有關他的研究資料收集却很少，所以希望能將他和朋友的書信以及日記能整理出版。這是我思想上一個很沉重負擔。此外，我覺得這部影印本印得不理想，而且對研究者來說，既不能普及，又是力有所不逮。經過再三考慮，為彌補這一缺陷，祇有排印繁體字鉛印舉行本。但是在當時出版界的具體情況下，這鉛排本又有誰肯印呢？躊躇了好久未能解

決。在偶然的一個機會，我讀到了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字慰堂）先生的《珍帚齋文集》書中載有抗戰時期他為政府組織搶救版本古籍的經歷。因而我想到「書信集」，如果能在台灣印行，就可以和當年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具體從事搶救工作的兩方面配合起來，那就成了抗日戰爭史上我國教育界搶救祖國版本圖籍的完整材料，這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某一天，我將一部影印本「書信集」贈送給趙景深先生的夫人李希同女士時，剛巧學林出版社社長雷羣明同志也在問候趙師母，我們相互間都很熟。當談到影印本書價很貴，不是一般讀者所能負擔時，我就將想排印鉛字本計劃，大約講了一下，也談到恐怕現在國內出版社不願出版的問題。不意雷羣明同志很爽朗地說：「為什麼國內不能出版」？他慨然認為：「學林」就可以出。學林因我的關係曾出版過兩本有關鄭先生的集子，我想：怎麼好再讓他們出賠本的書呢？雷的意見隨後又得到學林總編輯柳肇瑞同志的熱情支持，纔使這部排印本的「書信集」能够問世，同讀者見面。

關於這本書的來歷，要從一九八三年講起。當時，陳福康同志過訪，談起他在北京圖書館借閱有關鄭振鐸資料時，曾發現一盒顯微膠卷，係鄭先生寫給張詠霓先生的信，總計有三百多頁。因為沒有閱讀設備，無法詳其內容。我知道張詠霓先生解放前是國內著名的財政經濟家、教育家。鄭先生和他何以有這麼多書信來往，當時是很費猜想的。一九八五年，爾康世講來到上海，和他談到這組膠卷的問題，爾康告訴我，他家裏也藏有一卷。他返京後，隨即託人帶了給我，我設法約略地閱讀了一下，

纔明白這組謄卷是抗戰時期鄭、張兩先生為國家搶救版本古籍的通信，是一組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我建議爾康設法向北京圖書館將原件複印一份，複印件寄到後，共有三百數十封。經過仔細閱讀，纔恍然悟到：這些信正是鄭先生在「求書日錄」中提到的，他們花了兩年時間為國家搶救版本古籍的豐功偉績之記錄。鄭先生在「求書日錄」中是這樣寫的：

時時刻刻要和詠霓、菊生、柏丞諸先生相商，往來信札疊起來總有一尺以上高，這些信札，我在「一·二八」以後全部毀去，大是可惜，惟我給詠霓先生的信札，他却為我保存起來。

現在這些信，正是詠霓先生保存起來的。據《光華大學與張校長》中註文：「在鄭先生逝世前，由張氏後裔歸還鄭先生。」可見當時都很珍視這部分書信。一九五八年鄭先生殉難後，鄭夫人高君箴將鄭先生藏書捐獻給國家，連帶這部分書信也入藏北京圖書館。這是不可多得的珍貴的紀錄文獻！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日戰爭興起，鄭先生蟄居上海，不去後方，許多朋友都走了，也勸他走，他却敵人的魔掌下生活着。正是在這期間，他肩負起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重任：為祖國搶救、保存民族文獻！上海淪為孤島後，他冒着生命危險，為國家廢寢忘餐地搶救了《脉望館抄校本元明雜劇》，使沉沒三百年的國寶，終於為國家所有！當時東南各省著名藏書家所藏古代版本古籍大半散入上海舊書市。駐上海的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在為美國收購，敵偽的「華北交通公司」在為偽滿收購，旁及北方漢奸梁鴻志、南方漢奸陳羣，也在紛紛攫取。鄭先生慨嘆這樣下去，「兵燹之餘的古

籍，如果全部落入美國人和日本人手裏去，將來總有一天，研究中國古文學的人，也要到外國去留學！當時留在上海未去內地的鄭振鐸外，還有張元濟（字菊生，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壽鏞（字詠霓，上海光華大學校長）、何炳松（字柏丞，上海暨南大學校長）、張鳳舉（考古學家、版本收藏家），這五位愛國志士，目擊中華古籍精華將為敵偽所掠奪，或大量流出國外，異常憂慮和憤慨。他們每天商討挽救之策，最後決定必須立刻行動起來做搶救工作，就聯名打了幾個電報給重慶政府，希望由政府來幫助做這一工作。不久得到陳立夫（教育部長）、李家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覆電同意，並派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聰來滬協商。開始，擬推張菊生主持其事，張以病力辭不就。最後決定由張菊生、張詠霓、何柏丞、鄭振鐸、張鳳舉五人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並訂立辦事細則七條。當時中英庚款董事會存有中央圖書館建築費一百數十萬圓，因戰時無法建築，而幣制正迅速貶值，於是決定用來購書。

一九四零年年底，教育部又派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鴻寶（字森玉）問道來滬。徐為國內著名文物、版本鑑定專家，除負有使命外，並留滬協助鑑定收購善本工作，對運送圖書去香港轉赴內地多有勞績。從一九四零年一月十日起，迄太平洋戰爭發生日止，這個會為國家搶救版本圖籍整整工作了兩年，購買了善本古籍三千八百餘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餘種。當時北平圖書館（現北京圖書館）編有館藏善本圖書目錄四冊，藏館善本書目却僅載有三千九百種。五位愛國志士忘我舍身地工作兩

年，所購善本圖書差不多相當於北圖原藏善本之數，這成績是非常可觀的！

「文獻保存同志會」成立之日起，鄭先生除在暨南大學授課外，所有課餘時間，都投入搶救工作。他整天接待舊書商，書商們送來的版本圖籍，他一一親自過目，進行鑑定、論價。每天收購的圖書都要經過點查、登記、編目、裝箱、運送。貯藏雖另有工作人員，但他還要一一親自檢點。為了預防萬一發生意外，對於重要的孤本珍本，還設法錄副，或影印，或拍照、晒印，工作是很繁重的。這裏摘錄一九四零年三月二十日信中的一節，可以見到他們當時買書之艱辛與甘苦，處處以國家利益為重之忠誠。

我輩對於國家及民族文化均負重責，祇要鞠躬盡瘁，忠貞堅苦到底，自不至有人疵議。蓋我輩所購者，決不至浪費公款一絲一毫，書之好壞，價之高低，知者自必甚明瞭也。一方面固以節儉為主，同時亦應以得書為目的，蓋原來目的，固在保存文獻也。浪費，亂買，當然對不住國家，如孤本及有關文化之圖書，果經眼失收，或一時漏失，為敵所得，則尤失我輩之初衷，且亦大對不住國家也。故我不惜時力，為此事奔走。其中艱苦，誠是「冷暖自知」。雖為時不久，而麻煩已極多。想先生亦必有同感也。然實甘之如飴！蓋此本為我輩應盡之責也。

由於這幾位愛國主義者兩年忠貞堅苦，忘我的工作，當時江南所有藏書家，如常熟瞿氏鐵琴劍樓，趙氏舊山樓及翁氏、丁氏所藏，南潯張氏韞輝齋、劉氏嘉業堂、張氏適園、蘇州滂喜齋等的藏書，凡

有散出的版本，大都歸為國有。鄭振鐸先生等搶救得到的典籍，當時分為三部分，其一是「首先可列入國寶之林」的最珍貴之古書八十多種，由徐森玉先生運往香港，再由香港空運至重慶，入藏國立中央圖書館。這批國寶抵渝後，國民政府有關部門曾在重慶辦了一次隆重的展覽會，許多顯要人物、學者、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等各界人士踴躍參觀，轟動一時。其二是明刊本、抄校本等典籍約三千二百餘部。這些書初擬通過美國大使館將它作為外交文件運往香港儲存，後因故費時兩月陸續由郵局寄香港，由許地山先生負責收下，寄存在香港大學。據蔣慰堂先生在《珍帚齋文集》中所記，這部分書運抵香港後，他請示陳立夫，經同意決定在港一一在書上蓋章後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不意費時三月，書未運出，發生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這批典籍盡為日寇劫去。日寇投降後，蔣慰堂親往日本查訪，因全書蓋有「國立中央圖書館章」日寇無法抵賴，八十餘箱全部歸還我國。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政府敗退，便將這批珍貴典籍全部運至台灣。鄭先生在《求書日錄》中認為這是他最為抱憾、不安的事。他認為：「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許可以仍舊很安全的保全此地吧。」將來海峽兩岸統一後，這些版本典籍必定會重放燦爛的光彩。第三部分書籍，原分藏於上海幾處地方，最後全部歸藏於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覺園法實館內（覺園為佛教居士的一個社團），抗戰勝利後，這批書究竟由北京圖書館還是南京中央圖書館接收，不詳。

鄭先生的書信中對各種圖籍的鑑別、分析，論斷都非常精闢。因此，這一組書信，不啻是一部有

關版本、目錄學專著，足供後學者參考和研究！

在編輯鄭振鐸先生致張詠霓先生書信時，爾康又以編輯《鄭振鐸文集》收集到的鄭先生致其他友好
的書信見貽，因而一併編入本集。

張菊生先生的信，已在《張元濟友朋書札》中印出，因其中有關也是國元曲（即《脈望館抄校本元明雜劇》）的收歸國有，香港陳澄中的善本入藏北京圖書館等都和本集其他書信有互相引證關係，故仍收入，尤其陳澄中為著名的版本收藏家，當時在國內與周叔弢齊名，有北周南陳之譽，他所藏版本古籍能爭取歸來，是特別引起專家關心和重視的。

鄭先生在徐伯郊收購到陳澄中藏本後，認為從此善本圖書的收集工作，除了存在於台灣及美國者外，可以告一段落了。可見陳澄中的善本的珍貴和重要性！

當年陳澄中收藏最著名的版本為《昌黎先生集》，它與上海潘明訓所收藏的《河東先生集》，均為南宋世綵堂的精本，為全國所有之稀世珍本。陳澄中當時為中央銀行總稽核，與潘同為收藏家，因相友善。陳認為兩書同為稀世瑰寶，兩美應相合。因携兩萬鉅金詣潘明訓家，曰潘願收藏韓集，陳相讓，如潘願將柳集出讓，陳即以兩萬圓作酬，結果潘明訓表示七百年僅存之物，雅不願其離散，因將柳集讓與陳。現這兩件稀世瑰寶都已藏入北京圖書館。

上海淪為孤島以後，日寇隨即派特務進駐上海郵務管理局檢查往來信件。當時，鄭先生發出的郵

件很多，大都和搶救版本圖籍有關，如果一旦被敵寇查出，則不僅搶救古籍的愛國工作功敗垂成，而且可能會使很多愛國志士遭到日寇迫害。當時唐弢為郵局郵務員，他每天有機會在日寇檢查郵件離去之後，郵袋封口之前，將委託付郵的信件投入郵袋而後封口，可以萬無一失。鄭先生在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一日信中說：「寄發的方法甚為穩妥，可不經尋常收信員手，亦不經檢查，故可放心也。」本書收入的二十八封托代付郵的信，看來是小事，實際上反映了鄭先生和唐弢基於愛國主義的深厚情誼，也是唐弢冒着生命危險進行的對敵鬥爭的記錄。

解放前，上海從未有過國家建立的博物館。圖書館雖有幾處，也都為私家創辦的，規模很小。華東文化部成立，唐弢任文物處副處長，鄭先生寫給他的第一封信，就以建立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相囑，現今規模宏大的兩館就是在這情況下，得到當時陳毅市長大力支持而建成的。

建國之初，鄭振鐸先生膺中央之命，負責考古、文物工作。考古、文物之成立專管部門，是中國開始的。鄭先生葦路藍縷，組建文物局、考古研究所兩個機構，首先要收羅人才。他給夏竹銘先生的信，求才若渴之情躍然紙上。

對考古發掘工作的研究，如搜集漢代畫象石，修整武梁祠，保護敦煌千佛洞、龍門石窟等，因為百端待舉，研究項目很多，鄭先生在訪問捷克斯洛伐克及蘇聯時，作「中國考古工作報告」的情況表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活動等，在給夏先生的信中都較詳細地談到。

顧起潛先生收藏鄭先生的信，「文革」中多被劫散失，現在收入的一緘，是碩果僅存的。一九四九年春，鄭先生在白色恐怖下，避地去香港，臨行請顧老主持完成他自編自印的《玄覽堂叢書》，這是一封很值得紀念的信。

據徐文堪兄告訴我，他家藏鄭先生寫給徐森老的親筆信總在百件以上，「文革」抄家時被洗劫一空，僅存的祇有發表在本集中的三件。其中一件是很珍貴的，內容提到一九五七年鄭先生去蘇聯訪問講學。在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發現敦煌經卷和西夏文的佛經各有一萬多卷。在冬宮博物館中發現三大寶庫，一是敦煌壁畫和塑像，均為原物，二是甘肅黑水城出土的佛畫、道教畫和古物，三是新疆的壁畫和塑像等。以往是不為人所知的，也從未見諸任何著錄。鄭先生在致唐張、夏竹銘先生的信中一再提及。過去英國史坦因、法國伯希和連續盜劫敦煌經卷，鄭先生是非常憤恨的。而帝俄時代掠奪中國敦煌古物之多，經卷數量之巨，更足以驚人，鄭先生的內心也是可想而知的。

鄭先生給劉哲民的信，也編有《鄭振鐸書簡》。這裏收錄的，為唐張收錄而未編入《書簡》的。此外，一九四九年二月一緘，係鄭先生因白色恐怖，避地香港時所寫，頗有紀念價值。一九五三年一月一緘，是三十多年前鄭先生所寫參加運動後的感受。現在青年人恐很少知道當年運動的情況，於今很有現實意義，所以重予編入。

解放前夕，大陸收藏家所有古代書畫、版本圖籍以及古泉幣等，很多流往香港。我中央政府為充

實故宮博物院，決計設法收回流往香港的古物。徐伯郊兄與鄭振鐸先生為世交，曾任香港廣東省銀行經理，因而滯留香港。他家學淵源，精於鑑別古畫及版本圖籍，又和居港收藏家大都相識。鄭先生深知其為人，因以收購在港古文物相託，自一九五一年至五二年，徐伯郊為國家從香港收歸很多文物。

諸如寶禮堂潘世茲捐獻給國家的宋、元刊本一百零六種，就是由徐從香港設法運回國內入藏北京圖書館的。版本收藏家陳澄中攜港的珍本圖籍，郭昭俊收藏之三希法帖中之二希：王獻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遠帖》的歸來，都曾經徐的努力。此外，流在香港的唐、宋、元名畫，如韓滉的《五牛圖》，董源的《瀟湘圖》，宋徽宗趙佶的《祥龍石圖卷》，馬遠的《踏歌圖》，李唐的《採薇圖》，任月山的《張果見明皇圖》，趙孟頫的《三竹圖》，吳鎮的《漁父圖》，方從義的《武夷放棹圖》等，都是精美絕倫的稀世珍品，得以回歸祖國入藏故宮博物院，均為徐折衝之力。所以鄭先生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給他的信上說：

「你在香港的工作，是肯定有很大的成績的，我們都很感激你！你為國家人民爭取已流出國外的「重寶」，這是一件大工作。尚懇能多努力，獲得更大的成功！」

鄭先生給梁思永先生的信，大都涉及考古工作及古籍研究問題。其他還有如明刊本《天工開物》的發現，宋刊本《金石錄》、《尚書正義》的討論等等。

郭若愚先生研究殷墟小屯甲骨有年，編有《殷墟甲骨綴合編》。鄭先生予以高度評價，特介紹給中

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同志予以出版。

影印本在編輯將完成時，得知已故趙景深先生家也藏有鄭先生書信。當時《書信集》所收材料，篇幅已多。但念鄭、趙當年交誼很深，如果缺漏，將有遺珠之憾。因走訪趙夫人李希同。趙超林女士聞訊，送來家藏書信，並趙先生小傳。這些信分別寫於抗戰前、中、後時期，雖然文字簡短，但也反映了當時文藝和戲劇方面的一些情況。現一併收入，對趙先生也是一個紀念。

一九九二年一月

目錄

前言

劉哲民

致張壽鏞（詠霓）（二百七十通）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	二
附：朱家驊、陳立夫來電抄件	二
一九四〇年二月三日	四
一九四〇年二月四日	五
附：文獻保存同志會辦事細則	五
一九四〇年二月六日	七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三日	八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六日	九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三日（二通）	一〇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一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三
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日	一四
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	一五
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	一七

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	一八
一九四〇年三月九日	一八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三日	二〇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	二一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七日	二二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	二四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二五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二六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七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二八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二九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	三〇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日(二通)	三一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	三三
一九四〇年四月四日	六四

一九四〇年四月七日	六五
一九四〇年四月八日	六六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一日	六七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六日	六九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九日	七〇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日	七一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七二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七三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七三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五日(二通)	七四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七六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	七七
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	七九
一九四〇年五月三日	八〇
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八一